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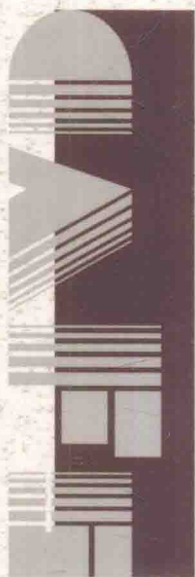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智库丛书
Think tank Ser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编

稳中求进的财税政策选择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for Steady Growth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智库丛书

稳中求进的财税政策选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稳中求进的财税政策选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9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智库丛书)

ISBN 978 - 7 - 5095 - 6864 - 4

I. ①稳… II. ①中… III. ①财政政策 - 研究 - 中国②税收政策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12. 0②F812. 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0630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4.25 印张 249 000 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864 - 4/F · 551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92, QQ: 634579818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智库丛书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刘尚希

编委会委员 苏 明 王朝才 罗文光

白景明 傅志华

总 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明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同时，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的支柱”的重要判断，充分彰显出财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的地位与作用。

强调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作用是促进改革和开放，财政改革主要是推动政府职能转换、改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国家实力逐渐增强以及大国财政使命的提出，财政在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日趋多样化、全方位，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结构及其整个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成员利益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对于财政在国家治理中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新的考验。改革开放初期，财政政策着眼于关注国内，对于国际环境关注不多，现在财政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初期，财政主要解决温饱问题，经济建设成为财政工作的突出任务，现在财政既要解决发展问题，又要解决改革问题，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文明要协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财政实力虽然都较弱，但地方政府债务也少，现在国家财政实力快速扩张过程中也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或有债务快速扩张的问题，财政自身可持续性发展面临挑战。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正在发生多维变化。改革开放初期，财政主要从经济维度发挥国家治理基础性作用，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社会转型、利益关系多元化背景下，财政要从多维度支撑国家治理：既有国家与市场的维度，也有国家与社会（个人）的维度，以及公共部门内部（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维度。

随着财政发挥作用的多维变化，财政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府承担的各种责任（城镇化、养老、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在不断增加，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呼之欲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打破了传统主流经济学、财政学的基本看法：政府与市场是水火不相容的，二者是对立的；公共服务领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只能由政府来干。过去注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工，现阶段则注重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进行再改革，一些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在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如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如何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理顺政府内部如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等。财政全方位、深层次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带来了许多需要用全新理论诠释的问题，也考验着各方面的智慧。

面对新阶段、新形势和新任务，财政如何有效支撑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需要新思路、新思想，财政智库或财政思想库也应运而生。可以说，财政智库是财政有效支撑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源泉，也是点亮财政作用于国家治理的“智慧之灯”。发达国家在财政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财政智库的作用功不可没。要发挥好财政作为国家治理基础与重要支柱的职能作用，财政智库的基础性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第一，财政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重要支撑。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破解财政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的财政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财政智库建设，以财政科学咨询支撑财政治理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以财政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第二，财政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必须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财政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新型财政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财政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财经和公共事务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正是考虑到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考虑到我国智库发展面临的各种瓶颈，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优质资源，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急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前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科所），于1956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而成立，2016年2月正式更名。60年前财科所成立之初，就定位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咨询机构，以探索我国财政经济问题和培养财政、会计专门人才为己任，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心工作服务，为财政经济发展的现实服务。为此，一代又一代财政科研人员为我国财政科研事业做出重要贡献。60年后的今天，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正致力于转型、创新，努力创建一流新型智库。

根据智库建设与发展的规划，本院推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智库丛书”。该丛书内容既包括本院各年度重要《研究报告》的文集，也包括本院承担完成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成果，以及本院研究人员研究、撰写的各类专著。目的在于集中展示财科院的科研成就，扩大科研成果的宣传和社会效

果，全面提升财科院的智库影响力。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将明确智库建设的宗旨，在传承既有科研优势和办院特色的基础上，探寻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的途径，潜心探索财政与国家治理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思路、新对策，与各界同仁一道，共同致力于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开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美好未来。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智库丛书”编委会

2016年7月

让宏观调控“归位”

(代序)

刘尚希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其中自然也蕴含着宏观调控要创新。而要创新宏观调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重新认识宏观调控，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

宏观调控 $\neq$ 干预市场

宏观调控的目的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即治理宏观风险，或说经济领域的公共风险。经济运行总是会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带来风险。但风险有两种：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前者是交由市场来处理，微观主体企业自己来化解。例如市场风险、财务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性风险等，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总是存在，不需要政府去干预。而宏观风险，则往往需要政府来防范与化解，例如通货膨胀、经济波动、金融海啸、外来冲击等等，这类风险要靠政府采取措施来应对。对于这两类性质不同的风险，长期以来混为一谈，以至于出现各种“干预市场”的观点。把宏观经济风险的存在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同样是因为混淆了这两类风险所致。政府与市场是经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所谓“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流行看法，是导致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的重要原因。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需要政府“归位”，有效治理宏观经济风险，这样才能真正稳定市场预期，让市场

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例如，对某种产品价格的干预、对微观金融风险的兜底、对企业产能的裁定等等做法，都是在干预市场，妨碍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而不是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权力调控

由于宏观经济内生的不确定性及其公共风险的存在，政府宏观调控不可或缺。但宏观调控首先是政府的一种责任，而不是权力。可长期来把这个问题给颠倒了，不是当作一种责任来履行，而是仅仅当作一种权力来行使，宏观调控一旦变为一种权力、权威，就不再是宏观调控，而是行政干预市场运行。宏观调控必须在“宏观领域”，实施调控的主要手段是财政货币政策，即通过对经济参数（通胀率、利率、投资率、消费率等）的影响来发挥作用，从而防范化解宏观经济风险。如果宏观调控变为微观干预，经济调控变为行政命令，宏观风险治理变为微观风险兜底，将会扭曲政府与市场分工合作的关系。

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减少经济波动。但当宏观调控从一种责任变异为一种权威时，经济不想波动都难。只有让宏观调控从一种权力回归到一种责任，才能真正达到治理宏观风险的目的。

宏观调控≠包医百病

宏观调控的作用对象是社会总需求，即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影响社会总需求，促进社会总供需平衡，减缓经济波动。由于对宏观调控的认识出现偏差，在我国过去的实际操作中，有一种倾向，凡是与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归结到宏观调控上，如过去有“银根”一说，意指货币的松紧；后来出现“地根”的说法，把土地供应也归结到宏观调控。粮食安全问题、农产品价格、房价、产能过剩等等，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这使得宏观经济只有“调控”而无“管理”，导致许多重大问题，事关全局性、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问题，也随着宏观调控的节奏变得时而重要，时而次要；时而刹车，时而加油。如电力、猪肉、棉花，过去都是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又少了；其政策是时而限制，时而鼓励。这实质上是在实施行政调控。宏观调控的扩大化，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掩盖了风险，导致风险累积、后移。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值得总结深思。

宏观调控≠治理长期风险

宏观调控带有应急的任务，应对的是短期宏观风险。与短期风险相比，当前面临的长期风险——中长期不可持续的风险凸显，转方式、调结构，是治理长期宏观风险的基本路径。宏观调控让位于转方式、调结构，也就在情理之中。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底线思维”，经济运行只要不突破底线，宏观调控就不需要出手。不难看出，宏观调控优先的短期操作思维有所淡化，长期风险治理摆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而长期风险治理依赖于宏观管理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对此，一直认识不足，过去都是以宏观调控代行了宏观管理的任务，宏观管理长期缺位。宏观管理缺位，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以宏观调控的方式去解决，能缓解一刻，治标不治本。深层风险不断积累，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此起彼伏。如发展方式问题、产业结构问题。问题越多，宏观调控就越是要强化；宏观调控越是强化，越是替代宏观管理，问题就越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要破解这个循环，必须让宏观调控“归位”，让宏观管理“到位”，形成短、长结合的宏观风险治理机制。唯如此，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才能实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也才有可能。

目 录 ■ ■ ■ ■

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	
.....	贾 康 (1)
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及其化解对策建议 ...	贾 康 (7)
我国就业形势分析与若干建议	苏 明 (10)
能源回弹效应及其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	王朝才 杨晓华 Jatin Nathwani (16)
我国结构性减税中营改增试点效果分析及下一步改革设想	
.....	课题组 (28)
拉美与东亚国家（地区）中等收入阶段的税负、税制结构比	
较与启示	王朝才 戚 悦 (45)
中外消费税比较研究——起源、发展与现状	课题组 (61)
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找准定位，对症下药	
.....	傅志华 韩凤芹 申学锋 (95)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内涵、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	
.....	韩凤芹 李成威 封北麟 (107)
工业领域淘汰落后设备财税激励政策研究	课题组 (127)
农地生态修复与“藏粮于地”战略研究	王向阳 (156)
我国养老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课题组 (165)
以房养老：关键在定位	赵大全 (186)
财税政策的绿色转型及其改革建议	许 文 (192)
中美两国“政府花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效应比较及启示	
.....	文宗瑜 (206)
后 记	(214)

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

贾 康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也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往前看，寻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在“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使中长期发展与有效激发、如愿释放内生潜力与活力相结合，使经济增长质量真正提高，使强调多年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现实。而相关分析认识现在指向一个人们无法回避、议论纷纷的问题：为使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所面临的瓶颈制约得到破解，需要构建什么新的思路？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得到理论创新之光的烛照引领。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此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特别强调了什么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之上。（已有文献，有《财经》、《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浓缩和重点报道；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全文已发表在《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

作为研究者，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

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需反思。

我们已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都有很大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确又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另外，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后一方面的重视程度提升不上去。

我们还可以较直率地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实际上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间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 150 多年的老店任它垮台，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施以援手，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的理论界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页岩革命到 3D 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破”而后，我们还强调，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其实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如何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

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框架的对称性提高。这样的认识落到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通、越走越顺。

我们在上述基本认识后面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这里放在“双扩”概念之下）。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分析认识，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贡献。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

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简要地说，前面主张的这些“立”，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在落伍二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这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间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深知，相关的理论和认识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间，似还很难避免有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比如说一般的评议中对某个思路和主张很容易被简单地分类——某些观点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某些观点被称为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大政府，有些则被称为是主张第三条道路。

我们自己的认识倾向是希望能够超越过去的一些贴标签式的讨论，侧重点在于先少谈些主义、多讨论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来贯彻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必要在经济学框架之内、在对经济规律的认知领域之内，对这些讨论中的观点处处去贴意识形态标签。

还有，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强调。“一切从实